



## 更复杂的局面：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



作者：[莫里·奥伯斯费尔德](#)

2016年7月19日

世界经济仍面临各种下行风险，增长缓慢，而英国6月23日投票退出欧盟加剧了全球增长的下行压力。2016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迹象，例如，欧元区和日本的增长强于预期，大宗商品价格的部分恢复使几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益。因此，截至6月22日，我们本已准备小幅上调2016-2017年全球增长预测。但“英国脱欧”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今天发布的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报告了我们调整后的分析结果。我们4月预测全球产出2016年增长3.2%，2017年增长3.5%。目前，我们将这两年的预测均下调了0.1个百分点，分别降至3.1%和3.4%。相对于4月的基线情景，在新的基线预测中，直至2017年的增长减缓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之外，新兴市场经济增长表现的改善将被低收入经济体增长表现的恶化所抵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两个最大经济体面临困难的宏观经济处境，因此该地区增长预测下调，其影响严重：2016年，地区产出增长将慢于人口增长，意味着人均收入将下降。

预测的这种调整考虑到了“英国脱欧”的影响，同时也考虑到4月以来影响经济前景的其他发展变化。显然，欧洲特别是英国受到“英国脱欧”的直接影响最大。“英国脱欧”对我们的其他地区预测几乎没有影响。

尽管各地区所受影响不均衡，但我们的基线全球增长预测的总体下调幅度不大，原因包括我们经评估认为“英国脱欧”的负面影响相对温和。然而，这一情景是基于目前具备的国家层面数据，而“英国脱欧”后的这些数据依然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强调，“英国脱欧”的真正影响将随时间推移不断显现，从而加剧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只有在数月后才能化解。不确定性的增加进而可能加剧金融市场对负面冲击的反应。因此，尽管在我们看来，小幅下调的中心情景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但存在其他下行可能性，欧洲的增长率可能会低得多，并对其他地区产生明显溢出效应。

由于“英国脱欧”的未来影响相当不确定，“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除基线情景之外，还描述了两个基于模型的其他情景，一个是结果更差一些，另一个则差得多。这两个情景的驱动因素是“英国脱欧”在以下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最终贸易关系；谈判的持续时间和争议程度；市场难以判断由此产生的需求抑制效应；以及金融条件相应收紧导致欧元区银行部门普遍出现压力。在这两种其他情景中，“英国脱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要比我们目前预计的更具破坏性。此外，这种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要比目前看到的更大，从而引发严重的负面金融反馈循环。

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没有过于强调这两种其他情景（特别是更严重的情景），主要是因为金融市场在英国公投后的几周里呈现出了抗冲击能力，以有序的方式重新定价，吸收这一消息的影响。出现这种有利结果主要是因为主要中央银行已做好准备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市场对此有预期，实际情况也如此。但脆弱性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一些欧洲银行。

## 前景面临的风险

除了与“英国脱欧”不确定性本身有关的下行可能性外，由于世界经济长期存在脆弱性和压力点，经济前景继续面临其他下行风险。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者给许多国家（包括接收国和来源国）带来压力。这种压力会造成政治和经济影响。另外，还存在地缘政治风险，一些国家还面临政治冲突。许多经济体仍需解决实体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危机遗留问题，包括长期持续失业带来的人力资本损失、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仍有大量不良贷款等。新兴和低收入大宗商品出口国在艰难应对资产负债表压力、债务积压和投资低下问题。中国正在转向更大程度上以消费者和服务业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这种转型是可喜的，但道路可能崎岖不平，特别是考虑到信贷仍在继续扩张以支持官方增长目标。

这些持续存在的风险，加上“英国脱欧”带来的进一步风险，更加令人担忧，因为长期潜在增长预期已经下降。这种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口和技术趋势产生的结果，但潜在增长下降会减少当前的需求，进而减少投资，从而导致未来的潜在产出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目前的需求疲软还会通过其他渠道削弱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这些渠道包括劳动技能丧失，劳动力参与程度下降，商业部门活力减弱，以及技术最佳做法的扩散速度放缓。

## 需要采取政策行动

政策制定者不应将当前的增长率视为“新常态”，认为这是受政策无法控制的因素所支配。风险并不仅仅是陷入持续经济停滞的纯粹经济成本。除此之外，经济增长缓慢的环境将加剧长期工资增长停滞、结构性经济变化和福利计划受损等方面的社会压力。这些压力促使各国寻求内向型解决方案，试图逆转长期全球趋势，但代价却是损害了在战后大部分时期促进了全球增长的开放、充满活力的市场。

政策制定者（甚至包括政治领导人）应分析这些长期发展趋势，反驳那种把问题完全归咎于全球市场的流行观点。但与此同时还必须让人们看到希望，使他们相信政策行动能够实现中产阶级的复兴，使选民认识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能够被更公平地分享。

鉴于政策空间在若干方面都受到限制，必须高效运用所有主要政策手段，包括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顺序安排合理的结构性政策，以及锚定通胀预期的货币政策支持。高效的一揽子政策将实现不同工具之间的协同作用；如果还能利用各国之间的协同作用，那么政策能更为有效。政策制定者现在更应考虑其政策措施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同时采取相应行动增强社会凝聚力。

\*\*\*\*\*

**莫里·奥伯斯费尔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目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休假。他是伯克利分校 1958 届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该校经济系主任（1998—2001 年）。在 1991 年前往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之前，他曾正式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79—1986 年）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86—1989 年），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9—1990 年）。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73 年获学士学位）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75 年获硕士学位），并于 1979 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8 月，奥伯斯费尔德博士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此之前曾担任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顾问（2002—2014 年）。他还是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成员。奥伯斯费尔德博士获得的荣誉包括蒂尔堡大学特亚林·科普曼斯资产奖、Rajk Laszlo 高等研究学院（布达佩斯）约翰·冯·诺伊曼奖和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伯恩哈

德·哈姆斯奖。他还发表了许多著名演说，包括美国经济协会的年度理查·伊利演讲、印度储备银行的 L.K.Jha 纪念演讲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格雷厄姆纪念演讲。他还曾在美国经济协会执行委员会工作，并担任该协会副主席。此外他还在基金组织和全球多家中央银行从事咨询和教学工作。

奥伯斯费尔德博士是两本主要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联合作者——《国际经济学》（第 10 版，2014 年与 Paul Krugman 和 Marc Melitz 合著）和《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1996 年与 Kenneth Rogoff 合著）。他还著有 100 多篇关于汇率、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的研究文章。